

《无名的裘德》研究在西方

黄 晖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着重研究英国著名作家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在西方评论界的接受历程,结合哈代研究的整体脉络,重点分析了现实主义与社会文化等各种批评视角的不同解读路径,并对这些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目的在于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哈代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无名的裘德》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2-0063-06

一、现实主义批评与社会文化视角

《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是哈代应《哈泼斯》月刊之约写作的。1894年10月,杂志编辑阅读了哈代的手稿,认为小说不适宜在杂志发表,哈代最后只得同意进行删改。所以,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的是经过删改了的小说,1895年底出版的一卷本才是按原貌出版的。小说出版后招致了比《德伯家的苔丝》所遭受的更为猛烈的抨击。1896年1月,奥利芬特(Oliphant)在《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上发表文章,矛头直指小说的社会意义,认为哈代是在鼓吹“自由恋爱”和攻击传统的婚姻制度。在她看来,哈代创作这部小说有两个目的:一是在成功地塑造苔丝这一女性的光辉形象之后,展现女性的破坏性,而艾拉白拉和淑从感性和知性两个方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是通过裘德的遭遇来质疑婚姻制度的合理性。这篇评论对哈代的批评毫不留情,语言犀利,对小说中的“不雅描写”,更怒斥是“对公众的侮辱”。《文人》(The Bookman)杂志称《无名的裘德》是“一本邪恶的小说”,并把它归入最伤风败俗的作品之一。显然,《无名的裘德》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震动了按照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

尽管哈代深受责难,《无名的裘德》被说成是破坏家庭和宗教基础的不道德的教科书,但是他仍然得到当时一切有识之士的支持,史文朋(Swinburne)就是哈代的支持者之一,尽管他认为小说过于残酷,但他还是满怀激情地赞扬了哈代,“也许你愿意当或仍然当一名最富有悲剧性的作家,无疑你也许就是最富有悲剧性的作家,因为巴尔扎克已经去世,因而小说中一直没有这种悲剧。自从他去世以来,全然没有这类作品了。”^[1]

对哈代最有力的支持来自《星期六评论》。作者在文章开篇首先分析了公众和评论界非难《无名的裘德》的原因,指出由于公众和评论界一度过于热衷谈论两性关系的小说而带来了反弹,使得近来公众和评论界拒绝接受任何涉及性的作品,而这几乎成了他们是否接受作品的唯一标准。作者认为哈代敢于在此时出版小说,挑战这种愚昧是非常可敬的。文章指出小说的主旨根本就不在于性,而是裘德对于基督寺的迷恋。哈代在作品中第一次真切地描绘出劳工阶层对教育的渴望以及他们所面对无法克服的困难,裘德的遭遇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下层的现实处境,因此1895年将是文学史中值得纪念的日子。文章的结尾部分对小说的成就加以肯定,“假使哈代先生没有写作其他的作品,这部作品也仍然会使他位列于英国小说家之前。”^[2]

收稿日期:2013-03-07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经典作家系列》阶段性成果之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8年度项目(08JC752009)与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项目(10CWW010)

作者简介:黄晖(1971-),男,江苏丰县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

哈代的好友埃德蒙·戈塞一贯是哈代的支持者,他在《世界都市》上撰文认为《无名的裘德》是一本压制不了的书,指出哈代在小说中体现出多种事物的对立,如裘德的理想与现实,四位人物之间的关系等。在人物塑造上,他认为两位女性人物十分出色,艾拉白拉的形象栩栩如生,而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描绘真实而完美。评论家哈夫洛克·埃尼斯(Havelock Ennis)在《萨达伊》上发表文章,为哈代的小说辩护。H·C·达芬(Henry Duffin)也认为《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最伟大的小说,“它的广阔的主题,无穷的内涵,把我们带进一个无限的思想空间”^[3]。美国作家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在1895年12月7日的《哈泼斯周刊》发表的《悲剧的快感》一文中认为“裘德这个形象本身尽管有着不少缺点和卑下之处,却是一个尊严不容侵犯的人。他是命运的玩物,但他始终崇高伟大。……它不仅具有一部伟大的悲剧所具有的那种庄严和崇高的效果;它还有小说中,特别是英国小说中,非常罕见的整体感。”

英国女作家伍尔芙在1928年发表《论托玛斯·哈代的小说》一文,认为《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所有作品中最令人厌烦的一部,完全可以称之为悲观主义的作品,她认为在《无名的裘德》里,议论被运用到凌驾于印象之上的地位,其结果是这部小说虽然悲惨的令人难以忍受,但不是悲剧作品。由于灾祸接踵而至,读者感到这种对于社会的控诉并不公平,或者是因为对事实没有深刻的理解。书中一点也没有托尔斯泰批评社会时那种使他的指控强大有力的广度、力量和对人类的知识。

1934年,英国学者恰普曼(Chapman)在《小说家哈代》中,批评哈代卖弄才学,以深奥替代朴素,认为《德伯家的苔丝》的结尾,简直就是弄姿搔首地在演戏;裘德对基督寺的幻想,也是大肆炫耀才学。在乡村生活的描写上使用了拙劣的维多利亚新闻文体,这几乎毁了《德伯家的苔丝》。对于《无名的裘德》,作者认为哈代把一些所谓的“哲理”作为深刻的思想强加给读者,并加上了拙劣的象征主义外衣,并以那个“时间老人”作案例分析。

阿尔瓦雷斯在《无名的裘德》的后记中认为该部小说之所以在出版后受到激烈的批判并非因为小说的主题是哈代的宿命论,因为自《苔丝》后,公众已习惯它;也并非小说对社会与宗教的攻

击;他认为是小说表现的“孤独”,没有这一主题,该部小说就显示不出它的任何力量。他发现小说中的人物聚在一起时,人物都是呆滞的、无表现力的,而一旦听其自然,人物便开始思索、鲜活起来。这一研究成果的视角非常独到、新颖。

二、现代主义批评与人文关怀视角

196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研究的勃兴,哈代成为文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而《无名的裘德》也受到评论家的普遍关注。这一时期以现代主义批评方法为主,评论家对小说的主题、形式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

《无名的裘德》往往被看成英国文学中第一部现代小说。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描写的“现代主义的痛苦”在这部小说中得到更为深刻的表现。在现代评论家眼里,裘德已不仅仅是一个传统小说中描写的人物,而由于其思想和遭遇的现代特点被看成了一个现代文学中的“反英雄”形象。正如纳桑克·费特尔在1966年为《无名的裘德》所写的序言中所说“他默默无闻和漫无目的地在灾难的海洋中漂泊。他是一个永远的迷路者和盲目机会的牺牲品,是他无法控制和不可改变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容易获取的猎物。”《无名的裘德》证明,哈代的创作已经完全发展到了现代时期,已经全面接触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层面。

英国著名小说家福斯特(E. M. Foster)在1976年出版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中认为“他(哈代)是从极为崇高的立场上构思他的小说的。他要将小说写成悲剧或者悲喜剧,他要他的小说在进展中发出命运的砰然巨响……他的人物深陷入种种的陷阱之中,终于都被缚住手脚、任凭宰割,他不断地强调命运的力量……命运高悬在我们头上,而非命运通过我们起作用——这就是威塞克斯小说最突出、最令人难忘的特征”^[4]。《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悲剧小说的典型代表,是一部含有道德意义的小说。小说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既是当时传统家庭伦理的作用结果,也是他们处理家庭伦理关系不当的致命惩罚。

像哈代所有的悲剧主人公一样,裘德是命运女神掌中的玩物,无法逃脱凄惨的下场。劳伦斯认为裘德无非是苔丝的翻版而已,裘德和苔丝身上都包含着男性和女性原则,艾拉白拉相当于亚

雷·德伯,而淑则对应于安吉尔·克莱。裘德是哈代全部小说中的一个崭新的形象——工人阶级的形象。评论家阿诺德·凯特尔认为裘德是“第一个工人阶级的主人公。他进入了二十世纪城市无产者的世界,并且本能地体察到这个世界的孤独。”^[5]裘德是哈代塑造的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形象。裘德和苔丝的不同在于他对自己的前途作出选择的时候,作者没有继续把他束缚在威塞克斯的农村社会里,而是让他到大都市当了建筑工人。裘德这个形象表明,哈代的小说创作同《德伯家的苔丝》相比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围绕小说中的性主题及女性再现,《无名的裘德》受到英美评论界持续的关注,引起广泛的论争。艾拉白拉设计诱骗裘德与她结婚,蔑视裘德的书本知识,从而迫使裘德放弃了追求学问的宏伟志向。劳伦斯对她如此评价:“艾拉白拉……在性格上有某种贵族气质。她相信自己,不被外人对她的看法所改变。……她认为自己是生活的中心,世上存在的一切,只要她想要,就该归属于她”^[6]。艾拉白拉是典型的自我中心性格。她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也没有除了物质福利之外的崇高理想。她所代表的是处于低级自然状态下的人。为了生计,她可以不择手段。

《无名的裘德》的评论流变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兴起几乎是环环相扣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尤其是淑,在《无名的裘德》的重要评论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作为主要人物的裘德反而往往只能在评论中充当辅助说明的作用。这种批评倾向的形成体现出西方社会女性地位的变化。评论界首先关注的是淑的性别意识。劳伦斯是早期对淑分析最为深入的研究者,他指出淑具有男性的思想和女性的身体,这种两重性使得她时时处于矛盾之中,而她对性的拒绝正来自于这一矛盾。哈代在1895年11月写给高斯的信中指出:她的性格没有丝毫变态或堕落……她的性欲如常人样健康,只不过需求弱小、有些挑剔。有一点需解释,我无法表达,那就是虽然她(与裘德)生有孩子,可她与裘德只是偶尔亲热,即使他们住在一起,淑惧怕婚姻仪式原因之一是担心会破坏与裘德之间的信任,与他在一起只为满足快感。此后,他们并未签署婚约,但她感到充分自由,按意愿尽可能少与他同房。

西方不少批评家都认为,淑只是个理论上的反社会常规的叛逆者,其实在她骨子里传统的宗

教观还是根深蒂固的。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在痛失儿女的沉重打击下回到费乐生身边去。威廉·J·海德(William Hyde)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无名的裘德〉中理论与实践的反常规》一文就代表了这一派学者的观念。海德认为,淑的前后鲜明反差,根源就在于她缺乏强烈感情来支撑她从穆勒那里得到的新观念^[7]。

罗伯特·吉丁斯(Robert Gittings)对淑的理智有以下解释:她不是1890年代的“新女性”,而是1860年代的“时代女子”,奉行的是以信仰为代价的实用主义^[8]。这与哈代在1912年小说再版前言中的观点是一致的:淑是“现代兴起的女权运动的原型——身躯弱小、面色苍白、理智冷静、思想解放的‘单身女子’”^[9]。

另外,还有不少评论家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对淑进行解读,得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有人认为淑具有新女性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她不甘委曲求全,像传统女性那样受僵化的社会规范的支配,正像阿德尔曼(Gary Adelman)所说的那样,“淑是维多利亚文学史上敢于拒绝‘牺牲品’这一命运的最成功的女性代表”^[10]。不管淑多么地背离传统,她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她身上所体现的矛盾特征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女性所面临的困惑,反映了当时女性自由发展和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了社会规范对女性发展的严重制约。罗伯特·海尔蒙(Robert Heilman)曾经这样评论淑·布莱德赫,“她反抗传统规范,但是她的反抗始终是受限的”。在淑的身上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事实,“她拥有思想的自由,却没有行动和存在的自由”^[11]。

淑极力反对妻子实际上是丈夫的奴隶的婚姻。正如劳伦斯所说的:“对于淑,婚姻不是婚姻,而是屈服,一种服务,一种奴役。她的女性精神没有和男性精神交织,她认为男性的精神是至高无上的,她渴望自己的精神能变成男性精神”^[12]。淑的这种婚姻伦理观的形成可追溯到她的童年时代:父母不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从小就在淑的身上造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以为婚姻就是不幸福,以至成年后的淑对婚姻有一种天生的惧怕感,并对一纸婚约就能带来幸福的婚姻这种传统的婚姻伦理观产生了排斥。淑后来遇到自己的真爱,也只同意与裘德保持同居的关系,而不肯立下那一纸婚约,因为她担心,婚姻会束缚她

们的爱情,成为爱情的坟墓。

三、形式主义批评与文化研究视角

197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深入发展为解读哈代的作品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视角不断变换。在这些新思路和新方法中,性别、欲望和视角等文化研究视角占据了主要位置。

梅赛尔在1972年出版《托玛斯·哈代:被压抑者的回归》一书,认为最能够充分表现哈代精神分析思想的两部小说应该是《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因为它们探索了人类自然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冲突。小说中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产生的原因在于这种冲突导致苔丝和裘德自我意识的觉醒,但他们两个人却被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所疏离和抛弃。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一方面关注的是肉体层面上的苔丝和精神层面上的安吉尔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禁锢的自我意识所束缚的方式。《无名的裘德》这部小说关注的重心是裘德的精神意识,在裘德身上融合了苔丝和安吉尔所体现的不同需要,“裘德渐渐痛苦地发现那些徘徊不定的自我意识正是现代社会造成的”^[13]。梅赛尔认为,哈代比乔伊斯和劳伦斯等现代作家更早的意识到人类精神或心理层面的复杂性。

伊安·格雷戈尔在1974年出版《哈代主要小说的形式》一书,从形式主义的角度研究哈代的小说。格雷戈尔认为《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最优秀的一部小说,“标志着哈代的小说创作在两个方面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一个是结构和风格,一个是主题思想”。在揭示社会力量是如何威胁裘德和淑争取个人自由时,哈代把着重点放在意识活动的描写上,这也就意味着对情节描写的放弃,“哈代以往的小说都最看重情节,而《无名的裘德》可以说是唯一一部用意识活动来代替情节的小说。”作品重点描写了裘德的“漫游漂泊的自我”^[14],这正是20世纪现代小说的主要手段。

玛丽·雅克布斯是较早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来进行哈代研究的批评家,她在1975年发表《无名的淑》一文中,揭示了淑复杂的精神世界和她的自我解放的本性。她认为由淑所引发的种种难题交织在一起在文本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一切又是因为哈代在淑的心理活动和她所代表的思想观念之间所建立的模糊关系所造成的。通过重点分析淑的意识活动,雅各布斯揭示了淑的

自我发现历程,她对传统观念的拒绝认同,以及她在与裘德的关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焦虑。然而,在失去了尚未出生的孩子以后,淑最后还是被她的女性的天然本性所击垮。这被视为哈代小说中对比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淑的崩溃而强化了裘德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力量和勇气。

戴尔·克雷默在1975年出版的《托玛斯·哈代的悲剧形式》一书,研究的重点是哈代小说的悲剧形式。克雷默认为哈代最后的悲剧小说《无名的裘德》反映了他对审判的相对性的关注,这种相对性削弱了悲剧意识的自我确认。吊诡的是,这部看似刻板教条的小说通过作者的抽离使悲剧达到一种客观与平衡,因为“故事中绝对的缺席,保证了人物和叙述者的几种不同观点的相对有效性”。这个悲剧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裘德所遭遇的基本的和终极的问题是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在这个世界里,他似乎没有真正的自由,也没有快乐的可能,在此语境中他所遭受的苦难无从解释。”^[15]

在哈代研究中,由梅赛尔、沃尔多夫等人提出的精神分析的方法,在罗斯玛丽·萨姆纳(Rosemary Sumner)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萨姆纳在1981年出版《心理小说家托玛斯·哈代》(Thomas Hardy: Psychological Novelist),她的研究是从哈代的《文学日记》入手的,哈代在这部著作中披露,他对当时的精神分析理论很感兴趣。夏默纳认为,哈代作品的复杂性表现在哈代对当时社会禁忌的批判态度和他对精神疾病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显然早于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如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等人。萨姆纳将哈代视作是位心理小说家,并认为“比起与他之前的19世纪作家的距离来,他的小说与弗洛伊德和后来的心理作家的作品的距离要更近得多”^[16],这是极为深刻的见解。

萨姆纳用了整整3章的篇幅来描写现代社会中男性和女性遇到的精神问题。在对性禁忌问题的思想过程中,她首先考察了《一双蓝眼睛》中的主人公,然后对安吉尔·克莱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考察,认为安吉尔在无意识的驱动下的超我和被压抑的情感冲突最终投射到苔丝身上。而在《无名的裘德》中,与心态平衡、性格开朗的裘德相比,淑在精神层面的表现更为复杂,作为一个对性感兴趣的现代知识女性,她是弗洛伊德式的性压抑的典型代表,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理智的边缘。

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与探索,哈代的小说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触摸到了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在几十年后才开掘出的人的隐秘世界,也给了20世纪的现代作家如劳伦斯等无穷的启示,成了现代主义心理描写的一个先驱。

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小说家对生活的呈现中,形式和结构非常重要,这一点对哈代也如此。哈代小说中的结构早已为评论家所注意,普鲁斯特、彼得·J·卡沙格兰德(Peter J. Casagrande)、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等都曾提到哈代小说中“重复的对称”(Repetitive Symmetries)模式。对比作为重复的特殊形式在《无名的裘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哈代自己曾说过:“它(《无名的裘德》)充满了对比——或者说我本意如此”^[17],可见,想象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塑造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无数这样的对比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6个以地点标记的6部分都以主人公的希望开始而以失望告终,而且这种希望和失望的比例是逐渐变小的,这种模式正好对应了其中想象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塑造及其各自力量的对比,因此可以说该安排奠定了整个小说的结构模式,使之成为一条主线引领主人公走向自己的结局。

文化研究是近年来《无名的裘德》的评论主流,评论家对小说文本所包孕的种种文化现象都给予剖析。斯各特·罗德(Scott Rode)研究的对象是《无名的裘德》中所描写的道路。他指出无论裘德、淑,还是艾拉白拉,他们从来都没有安定的居所,不断在旅行,而裘德所旅行的这些道路就是他唯一的庇护所。从裘德不断旅行的路途中,

可以看出人物对平等的性别关系和熟悉的社会氛围的渴求^[18]。马克·阿斯奎斯(Mark Asquith)从小说中的音乐呈现来分析文本,指出裘德和淑在感情上都颇为盲目,两人之间的对话十分苍白无力,只有在音乐的影响下,或是通过声音中的音乐元素,两人才能真正沟通彼此的心灵^[19]。这些研究揭示出小说文本中蕴涵的以往被忽略的社会文化元素,让人耳目一新。

《无名的裘德》在西方评论界的接受历程,反映出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折射出西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变化。通过我们对这一研究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到早期的评论虽然存在着各种社会价值观念上的局限,使得支持者的评论往往流于形式,未能系统阐释小说深刻的社会意义,但对小说主题的挖掘和对女性人物形象的肯定,都成为后来的评论家对这部小说关注的焦点。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的评论演进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评论界的观点流变,更可以看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发展。从最初评论中体现出的新旧社会价值观念的斗争,到成为解析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标本,直到小说文本成为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竞相争艳的舞台,西方学术界对《无名的裘德》的评论纷繁复杂,对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也颇具启发性。中国研究者需要在继续坚持本土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以文本的社会性为切入点,以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为主导,引入新的批评方法和视角,并不断扩大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与对话,共同促进哈代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 [1] Hardy F E. The Life of Thomas Hardy[M]. London: Macmillan, 1933:39.
- [2] Cox R G. Thomas Hardy: The Critical Heritage[M]. London: Routledge, 1979:283.
- [3] Henry Duffin. Thomas Hardy: A Study of the Wessex Novel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21:188.
- [4] Foster E M. Aspects of the Novel[M].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82.
- [5] Arnold Kettle.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Novel, 1953(2):45-48.
- [6] Lawrence D H. Study of Thomas Hardy and Other Essay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102.
- [7] William Hyde. Theoretic and Practical Unconventionality in Jude the Obscure[J]. Nineteenth - Century Fiction, 1965 (Sept.):160-165.
- [8] Robert Gittings. Young Thomas Hardy[M]. London: Heinemann, 1975:94.
- [9] Thomas Hardy. Jude the Obscure[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8.
- [10] Gary Adelman. Jude the Obscure: A Paradise of Despair[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2:11.
- [11] Robert Heilman. Hardy's Sue Bridehead[A]. Thomas Hardy: The Tragic Novels[C]. Houndmills: Macmillan, 1975:217.
- [12] Lawrence D H. Sue Bridehead[A]. Hardy: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C].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1963:71.

- [13] Perry Meisel. Thomas Hard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138.
- [14] Ian Gregor. The Great Web: The Form of Hardy's Major Fiction[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4: 139.
- [15] Dale Kramer. Thomas Hardy: The Forms of Tragedy[M]. London: Macmillan, 1975: 161.
- [16] Rosemary Sumner. Thomas Hardy: Psychological Novelist[M]. London: Macmillan, 1981: 7.
- [17] Harold Bloom. Thomas Hardy's Jude the Obscure -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10.
- [18] Scott Rode. Reading and Mapping Hardy's Road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89.
- [19] Mark Asquith. Thomas Hardy, Metaphysics and Music[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47.

Study on the Reception of Jude the Obscure in the West

HUANG 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ception of Thomas Hardy's novel *Jude the Obscure* in the West. Tracing the history of critical studies of the novel, i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and the new way i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 Hardy study;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west; *Jude the Obscure*

(责任编辑:李开玲)

(上接第 24 页)

Thoughts on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XU Yan-xia

(Training Center of Modern Leadership, Party School of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Taiyuan Shanxi 0300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academic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becomes more and more apparent. To strengthen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is critical to "establish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and reinforce the fundamental work".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keep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wa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academic;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Party construction; countermeasures

(责任编辑:李 军)